

新民學會之成立及其在法活動

陳 三 井

- 一、引言
- 二、「新民」一詞源起
- 三、成立日期新考
- 四、會章、會務與會員分析
- 五、響應赴法勤工儉學
- 六、在法組織與政治活動
- 七、結論

一、引 言

由於近代民族主義的風起雲湧，清末民初是學會活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根據非正式的一項估計，晚清十六年間（1895—1911）國人所成立的學會約在六百個以上，而民國以後的十年間（1912—1921）亦當超過四百個^①。

新民學會是五四前夕，一批湖南師範生如蕭瑜（旭東、子昇）、蔡和森（林彬）、毛澤東（潤之）等人在長沙所成立的一個學會性質的團體，後來思想產生分化，一變而為具有堅強政治目的的組織，會員中的激烈份子以後大多走上社會革命的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和最重要的幹部。所以，研究中共早期的黨史，不能不對新民學會的成立和發展情形有所瞭解。

新民學會可以說是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的急先鋒，由於湖南名流如熊希齡（字秉三，曾任國務總理、財政總長）、楊昌濟（懷中，曾任湖南一師教員及北大教授）的精神影響，以及蕭、蔡、毛等三人的積極推動，會員中贊助響應勤工儉學者極多，直接帶動湖南的留學風氣，使湖南參加勤工儉學的人數高達三、四百名之多，

^① 郭正昭，王光祈與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八——一九三六），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二期，頁九八。

幾為總數四分之一，居全國之冠。而且新民學會會員到法以後，繼續擴大組織，吸收新會員，並不斷從事政治性活動，使勤工儉學運動一開始即帶有濃烈的政治色彩，更使此一原本具有崇高教育理想的留學運動，困難叢生，不旋踵而告變質。故研究勤工儉學運動，自不能忽視新民學會在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二、「新民」一詞源起

「新民」一詞，乃是舊詞新用，據瞭解，文化的意義實多於政治的意義。其出處最早可以追溯到大學、湯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湯誥：「作新民」。

到了清末民初，「新民」成為最時髦的一個詞彙。尤其自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創刊「新民叢報」後，影響更加深遠。「新民叢報」發刊告白說：「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維新我國，當先維新我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②。梁啟超更撰「新民說」，釋新民之義，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列舉新民的十六項條件為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羣、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私德、民氣與政治能力，主張新民之道，「應採補其所未無而新之，以建設中國一種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③。這是對「新民」的最佳詮釋，新民之說遂廣泛影響到一些自命進步與革新的知識份子。

據毛澤東自述，自幼喜讀新民叢報，崇拜康梁^④，「新民學會」的會名無疑根源於此。民國九年一月，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曾組織「新民會」，推林獻堂與蔡惠如為正副會長，以從事民族運動^⑤。而晏陽初所領導的「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在民國一、二十年代所從事的鄉村建設工作，也就是一種「造就一批新民，以為建國、禦侮憑恃」的紮根工作^⑥。可見全國各地，不分南北，無論階層，莫不以「新民」為風尚，「新民」幾乎成為當時有識之士所共同努力追求的目標。

② 新民叢報（藝文版），第一號。

③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六月），專集，第三冊。

④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 120; 埃德加·斯諾原著，陳雲翻譯，西行漫記（香港南粵出版社，一九七七年），頁一三〇。

⑤ 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自立晚報社，民國六十年），頁八五。

⑥ 李孝悌，「平教會」與河北定縣的鄉村建設運動，參閱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聯經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一年），第八輯，頁三一四。

「新民學會」一名，根據蕭瑜的說法，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當兩人初議發起時，毛澤東說：「既然為學習的目的，不妨稱之為『新民學會』」^⑦。鄭學稼則認為，出之於蕭瑜的建議^⑧，這可能是誤讀蕭瑜自傳的結果。另有一說，會名由蔡和森提出，為大家所接受^⑨。惟翻遍「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與「蔡和森文集」，並未找到有力的證據，不知文集的編者何所據而云然？

三、成立日期新考

關於新民學會的成立日期，由於早期文獻缺乏，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最有趣的是，兩位最早發起人——蕭瑜與毛澤東，對於成立日期不是語焉不詳，就是錯得離譖。毛澤東曾告訴斯諾（Edgar Snow），他在一九一七年同幾位朋友，一道發起了新民學會^⑩，而對於成立的時間則略而不提。蕭瑜則說，新民學會是他和毛澤東兩人於一九一四年組織的^⑪，顯然他把醞釀發起與正式成立時間混為一談，故有此重大出入。

茲將有關新民學會成立日期的其他不同說法，列表顯示如下：

時 間	作（編）者	資 料 來 源 名 稱	出版年代	備 註
1917.秋	蕭 三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	1949	
1918.4.18	李 鏢	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	1957	
1919.4.某一期天	李 維 漢	回憶新民學會	1979	鄭學稼、王思誠、郭廷以、劉紹唐、黃利羣等人同採此說。
1918.4.	汪 浩 白 張 慎 恒	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	1980	
1918.4.	王 興 國	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	1981	
1918.4月中旬	戴 緒 恭	向警予傳	1981	
1919.4.17	新民學會 會務報告	五四時期的社團（一）	1979	
1918.4.14	蕭 三	蕭三日記摘抄（五四時期的社團）	1979	
1918.4.14	蕭 三	毛澤東同志在五四時期（青年運動回憶錄）	1979	
1918.4.14	新湘評論 編 輯 部	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	1979	
1918.4.14	梁 大 爲 等	蔡和森文集	1980	
1918.4.14	張 允 侯 等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1930	

⑦ Siac-Yu, Mao, Tse-Tung and I were Beggars,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59.

⑧ 鄭學稼，中共興亡史（中華雜誌社，民國六十八年），第二卷，（一），頁一〇一八。

⑨ 梁大為等編，蔡和森文集（北京，一九八〇），頁八三四，蔡和森生平年表。

⑩ Edgar Snow, *op. cit.*, p. 131; 西行漫記，頁一四三——一四四。

⑪ Siao Yu, *op. cit.*, p. 60.

創始會員之一的蕭三（子暲、植藩，係蕭瑜之弟），對於成立經過有較多的描寫，但籠統而不完整。他說：「（一九一七）暑假過了，同學們都從家裏回到學校。是秋高氣爽，楓葉開始脫落的日子，在湘江的對岸，岳麓山底下，在蔡和森同志的家裏——他家租住的『爲痴寄廬』內，集合了二、三十人。在吃飯的前後，人們在屋子裏，在河灘上討論學會的名稱、宗旨、章程，……。就在這一天，學會成立了。」^⑫

最早提到成立確切日期的是李銳，他說：「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八日的一個禮拜天，在長沙岳麓山潔灣市蔡和森家，開了新民學會的成立會。」^⑬由於早期可靠資料不多，這一說法最流行，大致也為鄭學稼^⑭、王思誠^⑮、郭廷以^⑯、劉紹唐^⑰、黃利羣^⑱等人及其他作者編者所採用^⑲。但鄭學稼進一步考證說，四月十八日並不是星期日，而是星期四^⑳，事實亦的確如此。李銳的說法犯了日期與星期不一致的錯誤，學期中利用星期日開會的可能性很大，而十八日顯係記憶之誤，所以這不是最後定論。

由於李銳的說法仍有漏洞，因此文革後討論此一問題的大陸作者都採取比較模糊的態度，不做日期的確定。例如，也是新民學會會員的李維漢回憶說：「一九一八年四月的一個星期天，在長沙岳麓山劉家臺子（又叫周家臺子）蔡和森家中召開了成立大會。」^㉑汪澍白、張慎恒^㉒與王興國^㉓在他們的著作中，都謹慎的只提到一九一八年四月。戴緒恭則乾脆以四月中旬來表示^㉔。

研究「新民學會」，當然視「新民學會會務報告」或「會員通信集」為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毛澤東曾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初會員之間的重要通信，按內容和時間彙編成三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並且在一些信的前面加上了醒目的

⑫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北京，一九四九），頁八十二。

⑬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一九五七），頁七十二。

⑭ 鄭學稼，前引書，頁一〇一九。

⑮ 王思誠，毛澤東與紅禍（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六十六年），頁五十五。

⑯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八年），第一冊，頁三七四。

⑰ 劉紹唐主編，民國大事日誌（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六十二年），第一冊，頁一一四。

⑱ 黃利羣編著，留法勤工儉學簡史（北京，一九八二），頁一三一。

⑲ 採四月十八日說法者，就手頭資料所見，尚有下列二處：五四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一九七八），第一集，上冊，頁五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七十年，六月），中華民國七十年一至六月份，頁四三九。

⑳ 鄭學稼，前引書，頁一〇一九。

㉑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頁四。

㉒ 汪澍白、張慎恒，青年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歷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五期，頁四十八。

㉓ 王興國，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一九八一），頁二〇四。

㉔ 戴緒恭，向警予傳（北京，一九八一），頁三十一。

標題和按語。第一集共十三封信，第二集共三十封，第三集有七封，所涉及的內容頗廣，包括國際國內大事、人生觀、宇宙觀、哲學思潮、新民學會會務、勤工儉學以及有關共產主義理論和共黨建黨問題的討論。「通信集」由長沙文化書社印發，未對外發行^②，故流傳不廣。最近陸續刊行的史料彙編，如「五四時期的社團」、「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新民學會文獻匯編」等，都摘錄或重刊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與「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而「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明白寫着：「民國七年四月十七日學會成立，在湖南省城對河岳麓山劉家臺子蔡和森家開會」^③。這份學會的正式文件，按理比較可信，但不知何故，海峽兩邊的學者除張允侯等所編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書曾指出其記載有誤外^④，對此似均視若無睹！當然，四月十七也不是星期日，而為星期三，至此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五四時期的社團」一書，發表「蕭三的日記」，對於懸案已久的新民學會成立日期問題，應該是一項重大突破！該日記是用毛筆寫在湖南第一師範附屬小學校的綠色直格筆記本上的，在四月十四號（陰曆三月初四日），星期日這一條下寫著：「新民學會今日成立，開成立會於對河潔瀨寺側劉家臺子蔡君林彬寓。」^⑤蕭三本人也根據這日記所載，在一篇文章裏，一改三十年前那種含糊的說法，而這樣寫道：「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我記得，那是一個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日子。在湘江的對岸，岳麓山下面，蔡和森同志的寓所裏，集合了十三個人。在吃午飯的前後，人們在屋子裏，在河灘上，討論學會的宗旨、名稱、章程……。就在這一天，新民學會成立了。」^⑥短短的記載，主要改動兩處：一、把成立日期由秋高氣爽，楓葉開始脫落的秋天，一變而為春光明媚，百花盛開的日子；二、將參加人數，由二、三十人減為確定的十三人。至此，以文字可靠的記載改正了過去純憑回憶寫作的錯誤，也解決了眾說紛紜的新民學會成立日期問題。

有了蕭三日記佐證，四月十四日的說法較合乎事實，且無懈可擊，遂為「新湘評論」編輯部^⑦、梁大為^⑧、張允侯^⑨、胡華^⑩等人所採用。後出之著作或史料彙

② 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一集，上冊，頁一五一。

③ 五四時期的社團（北京，一九七九），（），補遺，頁五七五。

④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上海，一九八〇），（），頁一四〇。

⑤ 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九。

⑥ 蕭三，毛澤東同志在五四時期，參閱「青年運動回憶錄」（北京，一九七九），第三集，頁三。

⑦ 「新湘評論」編輯部，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北京，一九七九），頁七十九。

⑧ 蔡和森文集，頁八三四。

⑨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一四〇。

⑩ 胡華主編的中共黨史人物傳，其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提到何叔衡、羅學瓊、蔡和森等人參加新民學會時，都已採用四月十四日的說法。

編，應可以此爲本，不必重蹈前人之錯誤。

四、會章、會務與會員分析

新民學會成立的目的，是要「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爲共同的活動」。在四月十四日的成立會上，通過了由毛澤東、鄒彝鼎起草，經蕭瑜刪削的會章。會章共十一條，主要內容爲：

第二條：本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爲宗旨。

第三條：凡經本會會員五人以上之介紹及過半數之承認者，得爲本會會員。

第四條：本會會員須守左列之各規律：

(一)不虛偽；

(二)不懶惰；

(三)不浪費；

(四)不賭博；

(五)不狎妓。

第六條：本會設總幹事一人，綜理會務；幹事若干人，協助總幹事分理會務；

任期三年，由會員投票選充之。

第七條：本會每年於秋季開常年會一次；遇必要時，並得召集臨時會。

第八條：會員每人於入會時納入會銀壹圓，每年納常年費銀壹圓；遇有特別支出，並得由公決徵集臨時費^㊲。

從以上幾條可以看出，學會成立之初，只是一批有志青年努力向上，敦品勵學，互助學習的一種純學會性的團體。

在會務方面，並選舉蕭瑜爲總幹事^㊳，毛澤東、陳書農爲幹事^㊴，大家並交了第一次會費^㊵。

在長沙的會員，於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曾在周南女校開過一次會，對會章略有修改，決議增設評議、執行二部，執行部下又設學校、編輯、女子、留學各部，並選

㊲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載於「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五七五—六。

㊳ 同前註。

㊴ 李維漢，前引文，頁四。

㊵ 李銳，前引書，頁七十三。

舉何叔衡、李思安（欽文、女）爲正副執行委員長，陶毅（斯咏、女）、周世釗（惇元）、毛澤東、周敦祥（女）、魏璧（韞庵、女）、陳書農、唐耀章（文甫）、蔣竹如（集虛）等爲評議員^⑧。

民國九年春，毛澤東、李思安等因湘事由京到滬，此時會友在滬者計十二人，因陳紹休（贊周）等五人赴法期近，遂於五月八日，在上海半淞園召開一次送別會。名爲赴法同學送別，實際上也是一次討論新民學會會務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於學會的方針、會務的開展均有較具體的決定，茲分述如下：

(一) 學會態度——學會應有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作風。毛澤東主張學會本身不多做事，但以會友個別方式去創造各樣的事。

(二) 學術研究——都覺會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張此後凡遇會友三人以上，即組織學術談話會，交換知識，養成好學的風氣。

(三) 發刊會報——陳紹休、蕭植藩謂會友相互間應有一種聯絡通氣的東西，故主張急切出版會報，但爲非賣品，除相知師友外，不送與會外之人。大家贊成就在上海發刊，推陳紹休擔任徵集在法會友的文稿，毛澤東負責在上海付印。後因湘事解決，會友陸續離滬歸湘，遂暫緩發刊。

(四) 新會友入會——都覺介紹新會員入會，務宜謹慎，否則不特於同人無益，即予新會友亦無益。遂議決介紹新會友宜有四條件：(1)純潔；(2)誠懇；(3)奮鬥；(4)服從真理。其入會手續規定如下：(1)舊會友五人介紹；(2)評議部審查認可；(3)公函通告全體會員，以昭審慎。

(五) 會友態度——大意謂會友間宜有真意，宜懇切，宜互相規過；勿漠視會友之過失與苦痛而不顧；宜虛心容納別人的勸戒；宜努力求學。

(六) 不設分會——學會前有在會友較多的地方設立分會之議，是日討論，覺無設立的必要，設分會反有分散會友團結力之嫌。如巴黎等會友較多之處，可組織學術談話會，定期召集^⑨。

新民學會在民國七年四月十四日於長沙成立的時候，共有十三人到會^⑩，可稱之爲創始會員，茲將此十三人的資料列表如下：

⑧ 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五七九；李維漢，前引文，頁六；

⑨ 同前註，頁五八〇。

⑩ 此十三人各家記載頗有出入，李維漢則加上自己變成十四人，參閱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四。新民學會會務報告只列十二人，有羅學瓊（云熙），而無何叔衡、鄒蘊真二人。

	姓 名	別 號	籍 貫	性 別	出生年	教育程度或出身	政治轉向	附 註
1	毛澤東	潤之	湘潭	男	1893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出國
2	蔡和森	林彬	湘鄉	男	1895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3	蕭瑜	子昇	湘鄉	男	1894	湖南一師	國民黨	參加勤工儉學
4	蕭植藩	子樟 (蕭三)	湘鄉	男	1895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5	陳紹休	贊周	瀏陽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6	張昆弟	芝圃	益陽	男	1894	湖南一師	共黨	參加勤工儉學
7	何叔衡	瞻岐	寧鄉	男	1876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8	羅璈階	章龍	瀏陽	男		長郡中學	共黨	未參加
9	鄒彝鼎	鼎丞	湘陰	男		湖南一師		1919年病故
10	鄒蘊真	泮芹	漢壽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11	周名弟	曉三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12	陳書農	啓民	長沙	男		湖南一師	共黨	未參加
13	葉瑞齡	兆楨	益陽	男		湖南一師		1918年病故

依上表，這十三名創始會員，可作以下幾點分析：

(一)論性別，十三人皆為男性，尚無一女性創始會員；

(二)論籍貫，十三人都是湖南人，充分顯示是一個地緣性質的結合；

(三)論年齡，除何叔衡已四十開外年齡較大外，餘多為二十出頭的青年；

(四)談教育出身，除羅璈階外，其餘多為湖南第一師範的前後期同學，可見初期這只是學校內部，尚非校際性的學會組織；學校畢業後，除兩人先後病故，何叔衡、毛澤東、羅璈階、鄒蘊真、周名弟、陳書農等人外，餘皆參加了赴法勤工儉學；

(五)關於以後的政治立場，除蕭瑜因與李煜瀛接近成為國民黨黨員，在國民政府任過職，葉瑞齡在一九一八年，鄒彝鼎在一九一九年病故外，其餘大都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蔡和森、張昆弟、何叔衡等人在一九三〇年代「革命」過程中被殺，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病亡，目前健在的尚有蕭植藩、鄒蘊真。

民國七年八月，學會開過成立會後，隨即加入的會友有下列九人：李維漢（和笙）、羅學瓊（云熙）、周世釗（惇元）、熊光楚（焜甫）、熊楚雄（瑾玎）、陳昌（章甫）、傅昌鈺（海濤）、曾以魯（星煌）、彭道良（則厚）^④，使得會員數

^④ 此一人名單，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與李維漢的回憶互有出入，前者列有何叔衡、李維漢、鄒蘊真三人，而無羅學瓊、彭道良兩人，後者有羅學瓊一人，而無何叔衡、李維漢、鄒蘊真三人。

目增至二十一人。

民國八年下半年，在五四運動浪潮中，又在湖南吸收了一大批會員，有姓名可查者是：羅宗翰（耻迂）、張國基（頤生）、夏曦（蔓伯）、蔣竹如（集虛）、易克櫟（閱灰）、向警予（俊賢，女）、陶毅（斯咏，女）、彭璜（殷柏）、李振翮（承德）、張懷（伯齡）、唐耀章（文甫）、沈均（均一）、李思安（欽文，女）、周敦祥（肫如，女）、魏壁（韞庵，女）、勞君展（啟榮，女）、謝南嶺（維新）、徐瑛（女）、劉修秩（繼庄）、鍾國陶（楚生）、張超（泉山）、姜慧宇（竹林）、劉明儼（望成）、歐陽澤（玉生）、楊潤余（女）、陳純粹、蕭道五、李雲杭、黃勝白等人。隨後，陸續加入的尚有易禮容（潤生）、任培道（振予，女）、吳家瑛（德庄，女）、賀延祐（女）、吳毓珍（女）、郭亮（靖笳）、謝覺哉（煥南）、陳子博、蔡暢（咸熙，女）、熊季光（作瑩，女）、熊叔彬（作璘，女）、許文煊（女）、周毓明（女）、戴毓本（女）等人^⑫。至民國九年底，會員總數已達七十餘人。

觀以上名單可知，（一）學會已由湖南一師純校內的學術社團，擴展為校際性的學會組織，會員已不限於一師同學，而發展到湘雅醫學專門學校、湖南蠶業講習所、湘鄉駐省中學以及長沙周南女校的師生；（二）新會員中女性會員佔十八人，比例相對提高，是其特色，這除了師友介紹與若干血緣關係外，大量吸收周南女校學生，是其主要原因。周南女校自校長朱劍凡於一九一九年暑假到任後，採取不少革新的措施，注意女子科學的教學，提倡學生自治，鼓勵學生參加社會活動，故在新民學會會員的影響下，周南女校的活躍份子如向警予、陶毅、魏壁、周敦祥、勞啟榮等都紛紛加入了新民學會^⑬。

五、響應赴法勤工儉學

積極響應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是新民學會成立後的一項重要活動，也是會員向外發展的一個主要措施。

由李煜瀛、吳敬恒、蔡元培等人所倡導的留法勤工儉學，到一九一八年夏天已進入高潮，積極展開，這時在湖南一師等校先後畢業的新民學會會員也面臨升學與

⑫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六。

⑬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四十。

就業的徬徨。不久，由湖南一師轉任北大教職的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告訴他們法國政府又繼續到中國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儉學的好機會^④，這一來適時解決他們選擇的難題。

一九一八年六月，新民學會在長沙第一師範附屬小學召開一項會議，專門討論留法勤工儉學和會友向外發展的問題，到會者有何叔衡、蕭瑜、蕭植藩、陳紹休、周世釗、蔡和森、毛澤東、鄒彝鼎、張昆弟、陳書農、李維漢等人，咸認留法運動確有必要，應盡力進行，藉以「修學儲能，為救國救民培養人才」，並議決由蔡和森與蕭瑜專負進行之責^⑤。

會後，蔡和森受學會委託，於同年六月二十三日乘船離長沙去北京，籌備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蔡至北京後，經楊昌濟之介紹，先後會見北大校長蔡元培與李石曾，知留法儉學及勤工儉學頗有可為，乃函告湖南會友，從事邀集志願留法之同志。起初願往者極少，至八月間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此時會友在北京者已有蔡和森、蕭瑜、蕭植藩、陳紹休、張昆弟、鄒彝鼎、李維漢、毛澤東、羅學瓊、羅璈階、熊光楚、曾以魯等十二人。除羅璈階在北大文科就讀，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外，餘均在留法預備班，其中張昆弟、李維漢、曾以魯三人在保定育德中學留法預備班，蕭瑜、蕭植藩、陳紹休、熊光楚、鄒彝鼎、羅學瓊等人在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⑥，蔡和森一人則在蠡縣布里村留法工藝實習學校，一面教國文，一面學法文，並負責管理這十幾人的學習和生活^⑦。

在勤工儉學的浪潮中，身為新民學會主要發起人之一的毛澤東卻決定留在北京，不去法國。據蕭瑜自傳說，毛澤東決定不出國的理由有四：第一是旅費問題，他籌不出幾百大洋的川資；第二、他自知沒有學習語言的天賦，在學校時，即使最簡單的英文拼音他也無法讀得準；第三、他認為留在北京可以繼續進修，而且為新民學會徵募新會員；同時，去法國留學的人也需要在國內有一個可靠的聯絡人；第四、他強調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人物，學術研究是沒有多大用處的，主要是要有能力組織一個政黨，並結合許多忠實的追隨者。總之，他無意為了讀書而出國，讀書只是一種結識朋友的手段，而留在國內卻可以結識更多的人^⑧。

④ 王興國，楊昌濟的生平及思想，頁一八三。

⑤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見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五七七。

⑥ 同前註。

⑦ 蔡和森文集，頁八三五。

⑧ Siao-Yu, *op. cit.*, pp. 170-171.

新民會友中，首先赴法者是蕭瑜。一九一九年一月，因凡爾賽和會期近，他以秘書的身份，追隨李石曾赴法，為華法教育會辦理勤工儉學事宜^{④9}。其後會友相繼赴法者共有下列幾批，分別是：

第一批有羅學瓊，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由上海乘日輪「三島丸」出發，先到英國，九月二日抵巴黎，該批共有勤工生五十八人^{⑤0}。

第二批於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乘法國郵船「寶勒加」(Paul Lécat)號自上海出發，同船赴法的有一百六十二人，內有新民學會會員李維漢、張昆弟及湖南青年李富春、賀果、李林、余增生、任理、張增益等共四十二人^{⑤1}。

第三批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乘法輪「蓋特萊蓬」(André Lépon)號出發，共五十餘人，內有新民會友蔡和森、向警予、蔡暢、熊季光、熊叔彬及蔡和森、蔡暢之母親葛健豪等人^{⑤2}。

第四批成行的會友有蕭植藩、陳紹休、熊光楚、劉明儼(望成)、張懷(百齡)、歐陽澤(玉生)等六人，他們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九日乘法輪「阿爾芒勃西」(Armond Behic)號出發。行前，在滬會友曾舉行送別會，並於啟航之日，握手揮手，送之於黃浦江岸^{⑤3}。

第五批有勞啟榮、魏璧兩位女會員，於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乘法輪「高爾地埃」(Cordillère)號出發，同行者尚有蔡元培及直隸女勤工生劉清揚等人^{⑤4}。

至此，新民學會會員到法國者共有十八人，除蕭瑜於一九二〇年十月一度回國外，其餘十七人之工讀情形大略如下：

蔡和森、蕭植藩、張昆弟、陳紹休、劉明儼、熊光楚、歐陽澤、李維漢等人先後入蒙達集私立中學(Collège de Montargis，舊譯蒙達尼，音誤)學習法文，有學校開給華法教育會的欠費清單為證^{⑤5}。當時勤工生就讀中學之人數，以蒙達集私中為最多，據華法教育會一九二〇年十月的統計，在該校就讀者達七十名之多

④9 Siao-Yu, *op. cit.*, p. 176.

⑤0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五二八。

⑤1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九——十。

⑤2 清華大學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北京，一九八〇)，第二冊，(上)，頁一一五。

⑤3 「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一號，參閱「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五八一；「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七一八。

⑤4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七八二。

⑤5 Archives National, 47AS2, B/6-2。據該項資料，蔡和森、張昆弟、陳紹休、熊光楚、李維漢、劉明儼等人皆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間入學，九月間退學，所欠費用在二百法郎至三百法郎之間，顯係暑假短期補習法文之需。

◎。

幾位女會員如向警予、蔡暢、熊季光、熊叔彬則就讀於蒙達集女子中學（Collège de Montargis, Jeunes Filles）。另初到法國的勞啟榮與魏璧則入南方一女子學校學習法文⁵⁵。

張懷在德勒（Dreux）的羅杜路私中（Collège de Rotrou）學習法文⁵⁶。

羅學瓊在法國中部克魯鄉（Le Creusot）地方一工廠內作電氣工。曾以魯在法國西南部一工廠作工⁵⁷。

六、在法組織與政治活動

新民學會會員參加赴法勤工儉學，陸續到法國後，除少部份外，大都集中在蒙達集地方的男女中學補習法文，故即以該地為活動中心，形成國外分會。蒙達集係法國羅瓦列省（Loiret）的一縣城，位於巴黎南方約六十哩之處⁵⁸，當時距巴黎約四小時車程⁵⁹，學膳費均較花都便宜，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衛等人均曾在此地之男子中學念過法文，男女兩校相隔僅二、三百步，故會友之間朝夕可以相見⁶⁰。

由於毛澤東不出國，蕭瑜在巴黎近郊的華僑協社工作，故蒙達集的新民會友顯然以蔡和森為領袖。蔡和森初到法，因校中功課淺，每日生活，全在空曠的公園中，不上課，「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頁」，「以翻看報章雜誌為事」，希望一方面把各國社會黨、各國工團以及國際共產黨先弄明白，一方面將社會、工團、無政府、德漠克拉西（民主）四樣東西作一番研究，而暫不作組織的活動⁶¹。蔡和森之所以把新民分會的活動暫且按住，不多吸收近千人的勤工生，主要還在加強學習，吸收新知，着重組黨理論的準備工作，俟機會成熟，擬在二年內成立一旗鼓鮮明，和俄國一致的黨⁶²。

⑤ Ibid, 47AS1. A/2-1(4).

⑥ 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五八三。

⑦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頁七七八。

⑧ 五四時期的社團（），頁五八二。

⑨ Nora Wang, Deng Xiaoping, The Years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92. (Dec, 1982), p. 699. 另蔡和森估計約二百里，以一哩等於二、七九四里換算，約一八〇里，即一百公里左右。

⑩ Siao-Yu, op. cit, p. 179. 一百公里距離，火車需時四小時，恐為蕭瑜記憶之誤，實際當一小時可到。

⑪ 蔡林彬寄出法國的家信，一九二〇年三月八日，蔡和森文集，頁二十四。

⑫ 蔡林彬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蔡和森文集，頁二十八。

⑬ 蔡林彬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三日，蔡和森文集，頁五十二。

學會現階段的發展方針既然崇尚潛在進行，到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爲了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在李維漢等人的倡議下，遂於一九二〇年二月組織了一個「勤工儉學勵進會」，簡稱「工學勵進會」，參加成立會的有李維漢、張昆弟、李富春、任理、李林、賀果、張增益等人，羅學瓊隨後也加入⁶⁵。該會宗旨，可分積極與消極兩面。在積極方面，想聯絡一班人共同做事，如儲金、定書報、互相勉勵、疾病救助、工學交互，及爲將來別種建劃之預備；在消極方面，可以免除孤獨生涯之煩苦，與環境誘惑之墮落及懶惰之預防等事⁶⁶。從最初的宗旨看出，工學勵進會一開始是實行工讀主義的一個團體，還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⁶⁷。它雖然以湖南旅法的新民會會員爲主，但只可視爲新民學會的一個外圍團體。

第四批成行，於一九二〇年六月間到法國的陳紹休、蕭植藩等人從國內帶來上海半淞園會議情況的消息。根據半淞園會議關於「巴黎等會友較多之處可組織學術談話會，定期召集」的意見，新民學會會員遂決定在蒙達集舉行一次聚會。一九二〇年七月六日至十日，來自各地的會員在蒙達集森林⁶⁸共開了五天會，與會者有蔡和森、向警予、蔡暢、陳紹休、張昆弟、羅學瓊、熊光楚、李維漢、歐陽澤、蕭瑜、蕭植藩、熊季光、熊叔彬等十三個新民會友，以及一些外省的工學勵進會會員，共二十餘人⁶⁹。

會議的議程由蕭瑜所列，第一項是討論何者爲中國革命的最合適計劃；第二項爲介紹新會員；第三是蕭本人報告最近返國的任務和計劃。經蔡和森提議，將第一項與第三項對調，因爲原列第一項議程，需要有較長時間的縝密考慮，故改放在最後⁷⁰。茲誌五天會議的大致進行情形如下：

第一日七月六日 個人感想（最近新知）

第二日七月七日 會務進行

第三日七月八日 會務進行（上午），求學方法（下午）

第四日七月九日 求學方法，個性批評（下午）

第五日七月十日 個性批評並對於未到會之會員之個性介紹。是日合案午餐，

⁶⁵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

⁶⁶ 羅學瓊給毛澤東的信，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五四時期的社團（一），頁二十二。

⁶⁷ 張洪祥、王永祥，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黑龍江，一九八二），頁六十九。

⁶⁸ 李維漢回憶是在蒙達集中學的教室，蕭瑜說是在森林裏，因利用中學教室另有其他非會員的中國學生出入，不够隱密，若在蕭瑜所下榻的旅館也有所不便，故蕭瑜的說法似比較合情理。Siao-Yu, *op. cit.*, p. 184,

⁶⁹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二。

⁷⁰ Siao-Yu, *op. cit.*, p. 186

連會外朋友共二十餘人，飯後遊公園照相^⑦。

這次會議最主要的決定是確立今後新民學會的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但會上對於改造的方法卻出現了分歧的意見和激烈爭論。以蔡和森為首的革命派，主張激烈革命，立即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即倣效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蔡和森所以堅決主張注重「國際色彩」，走俄國的道路，其理由有二：（一）俄國是共產主義之父，所以必須追隨俄國的領導；（二）從地理上看，中俄兩國唇齒相依，聯繫容易，一旦中國革命起來時，可以或明或暗的依靠俄國的支援，不論是經費或武器方面。

而以蕭瑜為代表的改良派，頗不以為俄式——馬克思式的革命為正當，而傾向於無政府——無強權——蒲魯東式的新式革命，故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人民謀全體福利的革命，以工會合作社為實行改革之方法，因為「世界進化是無窮期的，革命也是無窮期的，我們不認為可以一部分的犧牲，換多數人的福利」^⑧。參加討論的有陳紹休、蕭植藩、李維漢諸人。李維漢與蕭瑜的主張相同，也不贊成俄國式的革命，他在會後寫信給毛澤東說：「社會改造，我不敢贊成籠統的改造，用分工協助的方法，從社會內面改造出來，我覺得很好。一個社會的病，自有他的特別的背景，一劑單方可醫天下人的病，我很懷疑。」^⑨

會上，對這兩種對立的主張，沒有展開充分的討論，僅決定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毛澤東，希望聽取國內會員的意見。毛澤東接到兩種根本對立的主張後，即於同年十二月一日覆函蕭、蔡兩人並在法諸會友，對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而於蕭瑜與李維漢兩人的意見，雖在真理上贊成，但在事實上做不到，故不表同意^⑩。

蒙達集會議，導致新民學會兩位主要發起人兼理論家蔡和森與蕭瑜思想的分化，此後雙方思想愈走愈遠，蕭瑜與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接近，從事以教育為工具的改良工作，蔡和森則一直與毛澤東保持密切連繫，終於走上俄國革命的道路。

蒙達集會議對於「工學勵進會」的組織表示滿意，建議推廣。同年八月，「工學勵進會」改名「工學世界社」，社員已發展到三十多人。該社重要負責人之一的李維漢，原本支持蕭瑜的主張，但經過與蔡和森的幾次長談並閱讀他所翻譯的一些

⑦ 蕭旭東給毛澤東的信，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下，頁八〇五—八〇六。

⑧ 毛澤東給蕭旭東、蔡林彬並在法諸會友，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蔡和森文集，頁五十七。

⑨ 同前註。

⑩ 同前註，頁六十。

著作和宣傳十月革命的小冊子後，終於也同意，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是年九、十月間，工學世界社在蒙達集開會三天，出席的社員有張昆弟、李富春、羅學瓊、李維漢、賀果、李林、顏昌頤、張增益、任理、蕭植藩、唐靈運、陳紹常、傅烈、王人達、侯昌國、郭春濤、歐陽欽、劉明儼、汪澤楷、尹寬、蕭拔、薛世倫、鄭延轂、成湘等二、三十人。經過熱烈的討論，大多數社員贊成以信仰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為「工學世界社」的宗旨^⑯。蔡和森不是社員，卻應邀出席，在會上做了「怎樣救中國」的講演，並把自己從法文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抄成卡片，貼在開會教室的牆上，向大家講解，且參加了討論^⑰，對於「工學世界社」宗旨的改變產生很大的作用。

「工學世界社」是旅法勤工儉學中成立最早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團體。它成立後，把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作為一項重要任務。該社搜集了幾百種新思潮書報雜誌和各種小冊子，其中有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法國共產黨的「人道報」、「共產黨月刊」、「俄事評論」、共產國際的出版物「婦女聲」、「女權報」等，由社員分工進行翻譯和研究。他們還組織了一個「工學世界通訊社」，經常向國內各報刊發稿^⑱。「工學世界社」與「新民學會」雖屬兩個不同組織，但骨幹多為新民會員，至此宗旨又趨一致，儼然一體，今後在從事對外政治活動方面，更是亦步亦趨，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以蒙達集為中心的新民學會和「工學世界社」兩團體，在一九二一年曾先後領導參加了兩次勤工儉學生的政治活動，一次是二月二十八日的使館請願風潮；一次是九月二十日的進駐里大事件。

一九二一年初，赴法勤工儉學生已經到達一千六百餘人，但只有四分之一有工作，其他都「欲工無門」，唯賴華法教育會每天所發五法郎維持費度日。這時蔡元培到法，不但沒有為勤工生帶來好消息，反而發表聲明，斷絕與勤工生的一切經濟關係，這一來使學生大起恐慌，在希望幻滅下，遂爆發了二月二十八日四百多名勤工生包圍駐法使館，向公使陳籙請願的風潮，俗稱「二八運動」，結果學生數人被法國警察毆傷，在混亂中有一人被電車撞死，並有多人被捕。

⑯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三。

⑰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六十三；中共黨史人物傳，第六卷，頁十四。

⑱ 張洪祥等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簡史，頁七十一。

使館請願風潮的主要領導人是新民學會的一羣如蔡和森、向警予、李維漢、張昆弟、蔡暢加上工學世界社的賀果等社員，他們從蒙達集到了巴黎，住在華僑協社附近的一個兼營咖啡館的旅館內，連日與各地同學的代表開會商討進行方法，代表會提出爭取「生存權」、「求學權」的口號，要求發給學生每月每人四百法郎的補助，以四年為限。二月二十七日的代表大會為廣泛爭取社會各界支持，並向全體勤工儉學同學發出通告，向公使館和華法教育會發出請願書，向旅法上層人物發出請求援助書，向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發出電報^⑦。

二月二十八日晨，四百多名勤工儉學生在巴黎示威遊行，並推派蔡和森、向警予、趙世炎、王若飛等十人代表晉見陳鎣請願，雙方相持大半天，羣眾被警察驅散，代表十人被囚禁於警察局兩小時左右始釋放。使館請願風潮雖沒有達成原定目標，但迫使公使館延長發放三個月每人每日五法郎的救濟金，華法教育會也答應為失工學生找工作^⑧。

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日，向警予和蔡暢、勞啟榮、魏璧、熊季光、熊叔彬等六位新民學會會員，聯絡胡慕昭、林青萍、吳孟班、李志新、蕭珉、廖世劭等其他女學生共十二人，組織開放海外大學女子請願團，發出致國內女界的公開信，信中指出：「女子程度不足，實社會制度與教育所致……故程度不足，女子自身實不能負責，而負其責厥惟社會制度與教育，解決之者亦惟社會制度與教育」^⑨，要求女生有讀書的權利，要求即將成立的西南大學所屬的海外大學，招收女生。這可視為「二八運動」的餘波，又是同年九月發動的進駐里昂大學事件的前奏^⑩。

里昂中法大學，亦稱里昂中法學院，法文名稱為 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簡稱里大。中法大學的創辦，乃吳稚暉海外中國大學夢想的實現；由於他的鼓吹，以及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等人的支持贊助，遂得於一九二一年十月正式開辦。中法大學的設立，除主事者亦為勤工儉學運動的發起人外，原本與在法的勤工儉學生無甚關係，但一部分勤工生認為，中法大學未開辦前，曾以救濟勤工生的名義，收受各界捐款甚多，故在這批當時已走投無路的勤工生看來，里大的成立，正可解決他們的困境，當然寄以無限的希望。及至該校成立，由於宿舍容量有限，所招的學生分別由國內北平、上海、廣州等地直接選送，在法者必須經過甄選

⑦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四。

⑧ 同前註。

⑨ 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二)·下，頁五二三。

⑩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六十七。

始可入住，這種捨近求遠的作法，自然引起上千勤工生的恐慌與難堪，也可以說是希望的幻滅[◎]！

一九二一年九月五日，在克魯鄉工廠工作的一百四十七名勤工儉學生，在聶榮臻領導下，首先發出了爭回里比兩大學的宣言和通告。宣言上說：

「歷史告訴我們，正當的爭攘，不是惡德。經驗告訴我們，與的不如取的。里昂大學和中比大學，是中國平民教育的基礎。在歷史上，是因為我們勤工儉學生而後有。現在突變方向，任我們千數百勤工儉學生于顛連無告之中，而置之于不聞不問之外，所以我們要爭回。」[◎]

在致全體勤工儉學生的通告中，則揭示了進行運動的具體步驟：第一步就各地同學組織團體，籌商辦法，舉出辦事人；第二步即由各處團體，產生一全體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同盟；第三步即向法國方面及中國在法各要人運動，請為有力之幫助，並向里、比兩大學之當事人，作正式之談判，據理力爭，總期以和平達到爭回之目的。但若「兩校當事人，視我等困難如無睹，不肯容納我等之要求，則前途茫茫，危急萬狀，勢不得不鋌而走險，為最後之行動，以求一總解決。」[◎]

「宣言」和「通告」發出後，得到其他留法勤工儉學生的響應和支持，遂在蔡和森、趙世炎、王若飛等人的領導下，在巴黎發起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以統一領導爭回里比兩大學的運動。爭回里大的消息傳出後，九月十二日里大的校務管理機構即用「里昂中法大學協會」(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e) 的名義發出一份法文的「告留法中國學生書」，聲言中法大學是一所高等教育機構，所培養的人，「在回中國的時候，定當做教授，從事於各種相當科學的研究」。「對於收錄與考試學生，應呈驗文憑或經過考試」，並且「若非官費或有支付款項的確實保證，不能收錄。」[◎]這個通告無異粉碎了大部份勤工生想無條件進入里大的美夢。

「留法勤工儉學生聯合會」得此通告，立即通知各地勤工儉學派代表到巴黎開會，共商對策。九月十七日，各地代表在蔡和森、趙世炎的主持下，一致通過「以開放里昂大學為唯一目標」，並提出「誓死爭回里大」，「絕對不承認部份解決」，「絕對不承認考試」三個口號。大會原定派出代表赴里昂與校方談判協商解

◎ 陳三井編，勤工儉學運動（正中書局，民國七十年），引論，頁陸。

◎ 「克魯鄉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宣言，卞孝萱輯，留法勤工儉學資料，近代史資料，一九五五，第二期，頁二〇一—二〇二。

◎ 「克魯鄉工廠勤工儉學生爭回里比兩大運動團」通告，同前註，頁二〇五。

◎ 張允侯等編，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二十三—二十四。

決，但很快傳來了吳稚暉已從國內招收一百五十名學生，將於九月二十四日到達法國馬賽港，二十五日正式入校的消息，故引起大部份勤工儉學生的憤慨，表示除了直接行動外，沒有別的道路。九月二十日清晨，勤工儉學生代表大會發出如下緊急通告：（一）本會今日移駐里昂中國大學，巴黎方面留駐巴代表五人；（二）由本會於巴黎、聖日耳曼、楓丹白露(Fontainbleau)、克魯鄉、沙多居里(Chateau-Thierry)、墨蘭(Melun)、蒙達集等處同學中組織先發隊百人，隨同本會出發，佔據里大；（三）各學校各工廠勤工同學接到這通告後，請即日組織「援里隊」，陸續向里昂出發，最遲於通告到後四十八小時內，有代表三人以上赴里昂[◎]。周恩來、王若飛、李維漢、蕭植藩、徐特立等五人則留駐巴黎，負責聯絡，爭取聲援，並隨時與公使館進行交涉。

先發隊分兩批於二十一日晨先後到達里昂，合共一百二十五人。他們到達中法大學時，校方早有準備，將所有教室、房間的大門都上了鎖。先發隊只好在校后草地上暫待，並推派蔡和森等人為代表與里大當事人之一的褚民誼交涉。褚民誼與里大協會法國秘書給先發隊員加上「無錢、無學、革命黨」的罪名，通知當地警廳立派警察前來監視，並將隊員隨身所帶居留證與護照全行收去[◎]。

翌日（二十二），全體先發隊員被警察強行送入蒙呂克(Monluc)兵營拘禁，其間雖有公使館派遣副領事李駿前往交涉，留巴黎代表周恩來、李維漢等人也與陳鏗公使、吳稚暉校長有過談判，進行營救，但終歸無效。先發隊經二十餘天的拘禁後，終以四項罪名：（一）不得主權者許可，擅入人室；（二）侮辱市長；（三）發散傳單；（四）與共產黨的新聞記者接近[◎]，而於十月十四日被押送至馬賽乘法輪寶勒加(Paul Lecat)號回國，結束了一場以武力強佔里大校舍事件。這次被強制遣送回國的勤工生代表共一〇四人，內有新民學會與工學世界社重要份子如蔡和森、張昆弟、羅學瓊、賀果、劉明儀、顏昌頤、唐靈運、蕭拔、郭春濤等人[◎]。不久，已經和蔡和森結婚，並懷有身孕的向警予也從蒙達集啟程回國[◎]。從此，新民學會在法的活動無形中停頓。

◎ 周恩來，勤工儉學生在法最後之運命，旅歐通信（北京，一九七九），頁五十。

◎ 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一），頁二十五。

◎ 周恩來，旅歐通信，頁五十五。

◎ 李維漢，回憶新民學會，頁十五。

◎ 戴緒恭，向警予傳，頁七十。

七、結論

新民學會從民國七年四月正式成立，到民國十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組黨，新民學會逐漸停止活動為止，前後只有短短的三年多時間。

由於新民學會會員的參加與響應，壯大了勤工儉學的陣容；但也由於它的過份介入，激烈政治化的結果，使得一樁具有改良主義色彩，旨在為國家培植人才的留學活動逐漸變質，幾乎全盤斷送。

新民學會雖然還不是名符其實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但在其發展組織與從事活動的三年多過程中，透過會員之間不斷的討論研究，自我批評，提供給會員一個思想訓練，思想整合的場所，並藉此吸收會員，訓練會員，為以後正式共黨的成立提供一個「水到渠成」的助力。新民學會在法國的會員雖然不多，但它以勤工儉學為歷練舞臺，利用大批勤工生「勤工無門，儉學無路」的不滿情緒，運用組織的力量，結合各種不同程度的同情者或外圍團體，投入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政治活動，增進了實際的鬭爭經驗，吸取了從失敗中所得的寶貴教訓，培養了一些中國共產黨未來的重要幹部，這是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

結果，無政府主義者播種，而共產黨收穫^⑩。這更是耐人尋思而又何其不幸的歷史發展。

⑩ 美國學者布蘭德（Cornrad Brandt）認為，勤工儉學運動固然失敗，但遣送大批富有創業精神的青年學生到法，學習西方的各種方式，從這些富於進取心的青年學生當中，產生這麼多中國共產運動的領導者，亦絕非偶然之事。Cornrad Brandt, *The French-Returned Elit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Symposiu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38; 另參閱 陳三井，勤工儉學運動初探，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七十年十月），歷史考古組，頁一六一。